本版编辑：李少军
E-mail：t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049

重读经典

党的凝聚力从哪里来

——读《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体会

□ 李常官

近段时间，我认真学习了毛泽东1934年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文章共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群众生活问题，第二部分是关于工作方法问题。这篇文章蕴含着丰富的群众思想和深刻的民本道理。行程万里，不忘初心。今天重温这篇文献，对于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弄清楚党的凝聚力从哪里来，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提高服务群众的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凝聚力是在不断为群众服务中形成的

党的事业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密切联系的，这不仅体现在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体现在党的事业离不开群众的支持，而党的事业要取得群众的支持，就必须始终把关心群众生活作为重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明确指出党的事业与人民群众密不可分，在动员群众，依靠群众中形成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要获得群众的支持，必须关心群众的生活，并举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加以论证。反面典型是汀州市政府。他们在做工作时，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硬性摊派任务，对群众生活一点不理，而对群众有无柴烧、有无盐吃、有无房住、有无米吃等实际生活问题一点也不讨论，思想上不重视，工作自然推行不下去，结果群众不高兴了，会议也召集不起来了。正面典型是江西的长冈乡和福建的才溪乡。江西的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100个人中就有80个当红军。福建的才溪乡，100个人中有88个当红军。他们的工作之所以得到群众真心拥护，取得很大成绩，原因就在于他们懂得关心群众的生活，从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和群众呼吸相通，关心群众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比较，文章告诉我们关心群众生活是政治的、革命的，是得民心、顺民意的工作。

党的力量源泉在人民，党的凝聚力来自人民。革命战争年代，正是群众对我们党的信任和敬仰，才有了“最后一粒米，拿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拿去做军装，最后一个娃，送去上战场”的强大支持力。在建设和改革发展时期，我们党始终牢记宗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赢得了改革发展的不断成功。

当前，我们个别领导干部在思想上“人民观”淡化了，“群众观”淡忘了，在工作中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甚至以经济发展之名与民争利，解决群众问题没有形成主观的政治自觉。针对这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我们要切实把群众关心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精准扶贫、环境保护等 “民生工程”做好，让人民群众既看到改革发展的成效，又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始终站稳群众立场，群众就会坚定和我们党站在一起

我们党的根基在群众。毛泽东强调：“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这段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革命是为群众谋利益的革命，革命要想取得群众的拥护，争取群众的支持，就要真心实意地关心群众的冷暖。

毛泽东对关心群众生活强调了三个“一切”：“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由此可见，在他看来，关心群众生活不是关心某一方面或某一件事情，而是要解决群众的“一切”生活问题。

近年来，基础设施改善了，交通通讯发达了，但一些干部“官”气渐长，离群众渐远，下基层与群众的沟通交流反而少了，习惯于看材料、听汇报、电话遥控了解情况，凭经验、拍脑袋作决策，因此作出的决策与群众的要求往往差距较大，有的甚至背道而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站在群众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就能够感同身受。把自己摆进去感受，就能更好了解老百姓满不满意、拥不拥护。老百姓强烈反对的，我们就不能做。”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又进一步强调：“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要是笑，就说明政策好。要是有人哭，我们就要注意，需要改正的就要改正，需要完善的就要完善。”

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搞明白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想问题、办事情学会换位思考，体察民间疾苦，从群众的角度出发，站在群众的立场，不搞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事，不断夯实党的群众基础。

服务群众要着力解决过河中“桥”或“船”的问题

在这篇文献中，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如果将关心群众生活比作过河，那么工作方法就是过河的桥或船，二者关系密切。这好比布置工作，只交代任务，不提出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还是无济于事。所以，思路正确之后，方法显得尤为关键。

毛泽东倡导的工作方法是什么呢?在《长冈乡调查》小册子里，他指出，以实行社会救济为例，长冈乡苏维埃对“难民”“火烧了房子的，失业工人生病无药的”“饿饭的”“红军家属中生病困难的”均给予募捐救济，极大减轻了困难群众的负担，群众直夸“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总之，为了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为了切实改良群众的生活，长冈乡用尽了一切努力，想尽了一切办法。所以，他们就能够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不愧是革命战争和群众生活两方面的良好组织者和领导者。因此，毛泽东一再提醒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注意群众工作方法问题。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油画）

当前，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十分艰巨，要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绝不能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要让13亿中国人民共享全面小康的成果”目标，迫切需要各级干部的履职尽责和勇于担当，我们要坚决克服和纠正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不良风气，坚决反对“四风”，创新工作方法，健全服务机制，畅通诉求渠道，倾听群众意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态度和干劲，以科学管用的工作方法在为人民服务中交出群众满意的答卷。

总之，毛泽东的这篇重要文献，充分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精髓。在新常态下抓改革、抓发展、抓稳定，只要继承好、发扬好这个“传家宝”，我们党的事业就能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戴，我们就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用典释义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讲话原文】

古人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很多网民称自己为“草根”，那网络就是现在的一个“草野”。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不然怎么联系群众呢？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不断提高这项本领。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

【出处】

答曰：圣人作其经，贤者造其传，述作者之意，采圣人之志，故经须传也。……由此言之，书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折累二者，孰为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诸子尺书，文明实是。说章句者，终不求解扣明，师师相传，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

——（东汉）王充《论衡·书解篇》

【解读】

这句话出自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的《论衡·书解篇》。《书解篇》着重对儒家经籍以外的诸子百家的著述进行辩解，“书”即是指这类著述，因通篇采用对答的形式，故名“书解”。

汉代独尊儒术，用天人感应、谶纬迷信解说儒家经书以宣扬君权神授的儒生受到朝廷器重，他们的学说被立为官学；而对现实有所批评的“作书者”及其著述，被斥为“于世无补”的“玉屑”。王充指出，世儒（说经者）说经都是“虚说”，而文儒（著作者）“卓绝不循”的著作才是“实篇”。并提出了“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的观点。意思是，房屋是否漏雨，住在屋宇下的人最清楚；政策是否有过失，老百姓最有发言权；经书是否有错误，诸子的著述上写得明明白白。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进行了富有创意的现代解读。他称网络就是现在的“草野”，因此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为此，他号召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 （杨立新）

从哲学角度审视社会秩序问题

社会秩序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又是怎样的？如何才能建立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并使其发挥出应有作用？

□ 何忠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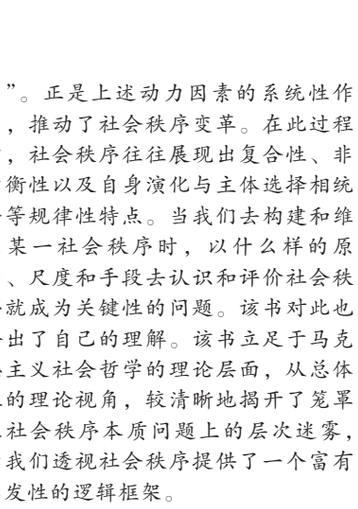
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是人们享有安定幸福生活的基本前提。社会秩序问题既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人们普遍关注，又在理论研究领域成为许多思想家们研究的重要课题。以往的社会秩序研究取得了丰厚的思想成果，如何吸收借鉴这些理论成果，进一步厘清社会秩序问题的本质，对于构建理想的社会秩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高峰博士的《社会秩序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视域下的秩序问题探讨》（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版）一书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在吸收借鉴思想史和当前学术界大量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社会秩序的本质、结构、功能、变革的规律、秩序评价等理论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探讨，并尝试运用理论研究的成果解读当代中国社会秩序，为理解社会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为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在社会思想史上，思想家们对社会秩序问题进行了大量探讨，却往往把社会秩序本质问题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然而，我们要维系社会秩序特别是构建理想的社会秩序，对社会秩序本质的理解却是绕不开的基础和前提。该书在学习和研究既有思想成果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层面上把社会秩序看作是“表征社会的存在属性和状态的哲学范畴”，并在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意义上，把社会秩序理解为既是一种社会“处于稳定状态的客观事实”，又是社会在运行和发展中“处于协调状态的内在价值取向”，而理想的社会秩序则是“稳定性与协调性的统一”。这一把握既与我们对社会秩序的经验性认知相符合，又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理论界以往对于社会秩序本质的理解。

既然社会秩序是社会的属性和状态，那么，理解社会秩序的前提性问题就首先取决于如何理解社会。该书在社会哲学的层面上，抽象出社会是“三种层次的存在方式”，即“实体、活动、关系（规范）”三个层次的有机统一。由此，社会秩序也就相应地划分为相互贯通的三个层次，即“作为社会活动的一致性状态、作为社会关系的结构化状态、作为社会规则的约束性状态”。这三个层次的有机统一构成了社会秩序这一总体性存在。具体而言，从“活动”层面看，正是由于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才使社会秩序的存在成为可能，“实践应是在现实基础上考察社会秩序本质的真正的逻辑起点”，社会秩序也正是社会主体在交往活动中通过合作生产出来；从“关系”层面看，现实的社会结构体系是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的层次化和结构化，只要这些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能相互适应，社会关系就会具有稳定性与协调性。因此，社会结构体系是“社会秩序存在的深层根据”；从“规范”层面看，社会结构体系的生产过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规范化过程，具有“约束性、导向性和协调性”等功能的社会规范体系构成社会秩序存在的“制度载体”。

众所周知，社会总是处于运行和发展中，社会秩序作为社会的性质和属性当然也就处于各种性质和形式的变革中。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迁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对于社会秩序也是如此。以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社会结构体系的演进”是社会秩序变革的“深层动因”，“个体需要的拓展”“群体或组织的利益博弈”“国家权力体系的推动”等构成了社会秩序变革的“主体动因”，而承载着社会主体意志和利益的具有约束性和规范性功能的“社会规范体系的更新”往往是社会秩序变革的“直接动因”。正是上述动力因素的系统性作用，推动了社会秩序变革。在此过程中，社会秩序往往展现出复合性、非均衡性以及自身演化与主体选择相统一等规律性特点。当我们去构建和维系某一社会秩序时，以什么样的原则、尺度和手段去认识和评价社会秩序就成为关键性的问题。该书对此也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该书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的理论层面，从总体性的理论视角，较清晰地揭开了笼罩在社会秩序本质问题上的层次迷雾，为我们透视社会秩序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逻辑框架。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历史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加快转型升级、社会大局总体和谐稳定，但由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仍然存在，影响社会秩序的潜在因素需要引起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随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深入展开，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时代的强音，《社会秩序论》一书可以提供具有创新性的理论支持。



书海泛舟

以协商民主提升治理能力

——读《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 李书省

李君如教授的新著《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建设。在书中，作者把全面从严治党放在党治国理政的大视野下进行审视和分析，紧紧围绕着“两个关键在党”，即“关键在党的领导，关键在党的建设”，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增强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最终实现党承担的“办好中国事情”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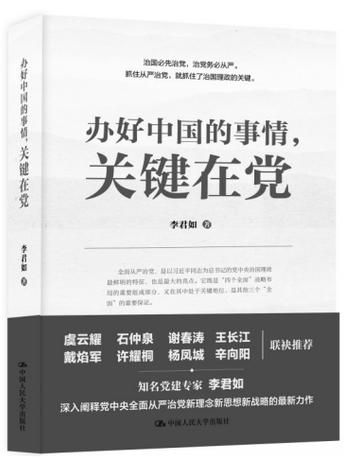
尤其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作者从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这一视角来解读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的路径。作者认为，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要加强党的价值观建设，增强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而且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推进党的领导制度改革、民主政治制度改革和法治中国建设，特别是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这样做，既抓住了党这个“关键”，又办好了“中国的事情”。

作者详细解读了协商民主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基本理论。在中国，协商民主不是以选举民主的补充形式出现的，而是有自己丰富的思想方法和实践经验。中国的协商民主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统一战线，我们党在统一战线中主要使用的工作方法是协商民主，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协商民主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一重要举措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结合起来，更有利于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作者认为在全面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中，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协商民主的科学内涵、作用、要求，以及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中形成的，也是中国共产党提高自己领导和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本书从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这一角度阐释如何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是在党建研究方面方法上的创新和视野上的拓展，对我们从事党建研究具有很好的借鉴和启示。

其一，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是通过“民主”和“法治”两个轮子驱动来治理国家的。世界和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告诉我们，民主不是只有选举民主一种形式，还有协商民主等形式，只有把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结合起来，进而把民主和法治结合起来，才能构建起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同样道理，现代化的执政党治理体系也是通过“民主”和“法治”两个轮子驱动来治理执政党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关键也要坚持民主与法治有机统一，特别是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有机统一，才能构建起现代化的执政党治理体系，最终才能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

其二，对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探索，不仅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有意义，而且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也有重要价值。尽管“协商民主”这一概念是从西方传到中国的，但是我们的协商民主实践和反映这样实践的理论要早于西方，中国协商民主理论无论是在理念、价值、制度、功能等方面，还是其具体实践路径都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和个性，是深深根植于中国的社会土壤并发展起来的。我们在协商民主方面已经有非常丰富的思想方法和实践经验，特别是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政治组织形式所积累的非常珍贵的协商民主经验。因此，我们要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对我们自己的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要充满信心，而不要妄自菲薄，不以为然。

其三，推动高层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中国多年积累的协商民主实践经验多是以政治协商会议和政党协商为载体，这样的协商民主往往以精英协商或高层协商的形式表现出来，协商议题主要涉及国家大政方针或区域重要决策。实际上，协商民主不但要面向国家治理的层面，更要面向人们日常生活层面。在涉及万千普通民众息息相关的基层领域推进协商民主，更容易激发民众参与，拉近政府与民众的距离。实际情况是，高层的政治协商早已制度化、常规化，基层协商民主的空间或领域却有待扩展。目前基层协商民主发展势头很好，主要问题是现在各地有很多探索，但是发展不平衡、运作不规范。推动高层协商与基层协商衔接，打通协商民主上行、下行两条路线，是协商民主发挥作用的关键，也是提高我们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的关键。



链 接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清晰、明了地勾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6+1”体系。所谓“6”，就是加强政党协商、积极开展人大协商、扎实推进政府协商、进一步完善政协协商、认真做好人民团体协商、稳步推进基层协商；所谓“1”，就是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李君如

书而思